

那天等公交车,站台上,我前面站着两个姑娘,看装束模样,像打工妹。寒风中,车好久没有来,两人跺着脚,东扯葫芦西扯瓢地聊了起来。聊得挺带劲儿,她忍不住咯咯笑。听她们的言谈话语,才知道已经不是姑娘了,都刚结婚不久,嘴里的“老公,老公”跟豌豆儿似的,叫得亲得很。

一个兜,自然没带一分钱。她对戴毛线帽的女人说:你知道我和我老公结婚后租的房子挺偏的,得倒两回,没钱买票,心想这可怎么办?我就对售票员说:我忘了带钱,你让我坐上车吧。人家还真的没跟我

公交车试验

肖复兴

我又说:我忘了带钱,你让我坐上车吧,人家又没跟我

要钱。我都到家了,我老公还在外面瞎找我呢,等他回来天都黑了,他进门看我在家,问我是不是打车回来的?我笑他,没带一分钱,还打车呢?说着,两个女人都像得了喜帖子似的笑了起来。售票员的善意,让小夫妻之间不愉快

的吵架也变得有了滋味。毛线帽对红头巾说:北京公交车售票员小丫片子眼睛长得都比眉毛高,没刁难你,让你白坐车,算是让你碰上了!

红头巾对毛线帽说:要不待会儿来车了,你也试试?你就说没带钱,看看是不是和我一样,也能碰上好人?

毛线帽没精打采的连连摇头:我可不敢,让人家连卷带损的数落一顿,别找那不自在!

红头巾却一个劲儿的怂恿,边说边推了一把毛线帽:没事,你试验一次嘛!

毛线帽回推了一把红头巾:要试试你!

红头巾撇撇嘴:胆子这么小,我试试就试试!

正说着,公交车已经进站,停在她们的前面,车门吱的一声开了。两人脚跟着脚的上了车。车上的人不算多,有个空座位,两人让给了我,好像故意让我看她们接下来的表演。

红头巾走到售票员的前面,毛线帽拽着吊环扶手没动窝,眼瞅着她怎么张开口。售票员是位四十来岁的大嫂,眼睛一直



龙起云涌
张屏山 篆刻

王辰肖龙,大街小巷龙腾不息、龙舞不止,各地还举行画龙比赛,呈现百龙千姿之状。十二生肖唯“龙”世间所无。既然无人见过“龙”,怎么来表现它呢?人们不得不驰骋想象,依据整个社会认知和生活实践感悟,信手涂鸦。龙有角还是无角?有足还是无足?有鳞还是无鳞?有翼还是无翼?有爪还是无爪?青色还是黄色?没有人能够说得清,即使是民俗专家、学术权威,至今仍在唇枪舌剑,争鸣不已。真正要繁荣“龙画”,在实践的基础上,一定会

略说古代龙画

顾云卿

相应理论产生,那就是五代南唐时画龙高手董羽的《画龙辑议》。《六如居士画谱》据说是明代唐伯虎汇辑的一本画谱,其卷三首次收录了《画龙辑议》。他首次提出“三停九似”之说。“三停”是结构学和相学术上的术语,即三个段落或三个部分,“自首至项,自项至腹,自腹至尾,三停也”。“九似”则是“头似牛,嘴似驴,眼似虾,角似鹿,耳似象,鳞似鱼,须似人,腹似蛇,足似凤”。董羽用修辞上“明喻”手法,即A像B,借世间确有其物的特点,移放到世间无之物身上,使之具象。这“三停九似”确实是一大发明创造,不仅对此前的所有龙画,作出了高度的概括和归纳,也对此后的龙画创作给了力!

后来,北宋郭若虚在《图画见闻志》中,将“三停”改为“自首至膊,自膊至腰,自腰至尾”,而将“九似”中四个部位改作“头似驼,眼似鬼,腹似蜃,耳似牛”,新添了“项似蛇,掌似虎,爪似鹰”,而去掉了“须、足、嘴”的特征,只保留了“鳞、角”两种,使得龙画的理论更加规范和全面。

龙画最早是实用美术,到了东汉才走向艺术化。三国东吴有个画家曹不兴,为讨好孙权家,画了幅“青溪见赤龙出水”图,图上标明送给当时只有3岁的孙权的子孙皓。名画家陆探微在秘府中见到此画,尝试将它放置水上,“应时蓄水成雾,累日滂霈”,还真像一条真龙呢!这段轶事,一说明当时阿谀奉承之风已盛,二也说明龙画技法在当年日臻完善。

唐开元中,关辅大旱,京师缺雨尤甚,少府监冯绍正提早在某殿西壁画一素龙,然后再令四壁各画一龙,“奇状蜿蜒,如欲振跃,绘事未半,若风云随笔而生”。皇帝与众官“于壁下观之,鳞甲皆湿。设色未久,有白气若帘窗间出,入于池中,波涌涛汹,雷电随起……不终日而甘露遍于畿内!”“画龙致雨”成了统治者乐此不疲的惠民神话。

龙画含义,高深莫测。唯物主义者当然可以不信,但宗教和信仰却大有市场。再加上偶然因素(如画龙那天正好有云腾致雨的客观气象条件),所以龙画自古以来都是绘画界流行的主题。

看了1月6日的文章《从“打衙祭”到“打牙祭”》后,感到很有意思,这亦使我想到了“打牙祭”与“过得匀净”这两个词。这两个词,是在改革开放之前经常听到与运用的词汇。我到重庆工作时,虽然已经过了三年困难时期,但是,当时的粮食、副食品、油、布等等都是计划凭票供应的。当年,要买肉吃了,当你提着肉在路上走时,同事看到了都会羡慕地向你说:“今天‘打牙祭’啦!”当年,每个人每月猪肉的定量是一斤,胃口好时一天就吃完了,省着点几分两次吃一次半斤,真如《从“打衙祭”到“打牙祭”》一文中所说的那样,一月两次祭城隍,不过,日子不一定是朔、

“打牙祭”和“过得匀净”

奚龙发

望,初一、十五罢了,祭的不是城隍,而是自己的“牙齿”。当年,如果家里人口多、肉票多,计划好的家庭主妇会安排好生活三天两头有肉吃、有荤菜吃,叫做生活“过得匀净”,如果,一年中只有过年那几天“过好日子”才有肉吃、开荤腥,那就不叫“过得匀净”。改革开放后,我国人民的物质生活有了极大的改善与提高,并且越来越好,随着各种各样票证的取消,吃肉、开荤早已不是什么问题,人们早已过上了“过得匀净”的生活,“打牙祭”、“过得匀净”这两个词人们使用得越来越少了,至于现在在人们日常生活中已经很难听到它们了。



原野春光

(山水画)

胡振郎

迎龙年新春胡振郎山水画展日前在程十发艺术馆展出。

展览会上的图画

盯着向自己走过来的红头巾,以为是来买票的,没有想到红头巾说:阿姨,我忘了带钱了,您看看能不能让我坐车呀?售票员面无表情,抬起手,一根细长的食指毫不客气地指指后面的毛线帽说:你没带钱,她也没带钱怎么着?

得,今天遇到的售票员不是个善茬儿,试验刚开始,就卡壳了。幸亏红头巾反应得快,回过头也指了指毛线帽

说:我们不是一起的。毛线帽只好配合着赶紧摆手又摇头。谁知售票员久经沙场,眼睛里不容沙子,对她们两人说:行啦,进站时候我早看见了,你们俩推推搡搡连打带闹的,还说不是一起的!像一气球,还

没飞起来,就被一针无情的扎破,满怀信心想试验一把,让夏天那个美好的回忆重现,没想到演砸了。红头巾一下子尴尬起来,瘪茄子似的耷拉着头,不知如何是好。售票员步步紧逼,嘴里不停地快着吧,麻利儿的赶紧掏钱买票,一块钱一张票都舍不得花?说得满车厢的人的目光都落在红头巾的身上,毛线帽赶紧走上前去,掏钱替红头巾买了票。

红头巾才像沉底的鱼又浮上水面缓了缓了神儿,对售票员解释:阿姨,不是我不想买票,我是想试验一下,看……售票员撕下票塞在她的手里打断她:行啦,试验什么呀?像你这样逃票的,我见得多了!

这时候,车到了下一站,车门打开,两个女人落荒而逃地跳下了车。我心里在想,售票员应该把红头巾的话听完,就明白了红头巾坚持试验的一点小小的愿望,也许就是另一种结局。但也不好,即使知道了红头巾试验的愿望,没准照样是这种结局。如今很多事情,结尾常南辕而北辙,美好芬芳的愿望如旷世的童话,早已经被现实磨烂得成了一双臭袜子。

相亲节目的诚意

徐士范

集择偶、娱乐、交友于一体的荧屏相亲节目,你方唱罢我登场,如今声浪频仍。有人戏谑个别相亲节目像公开的配偶市场,前来觅偶的男女,把自己当做待价而沽的商品。即便是寒冬,为秀出娇俏的身材,女孩们宁要风度不要温度,以反季节的袒肩露背装惊艳出镜。

上节目的女孩,大多追问男方是否有丰厚的收入、体面的工作或优越的家庭条件,而男嘉宾对女方的好感大多取决于外表。在众目睽睽之下,为迫到心仪的女孩,男嘉宾争先恐后,几乎都是信誓旦旦,言之凿凿,以一段精心准备的真情告白呈现在观众前,押出做人的诚信之本,又有多少人履行了诺言?他们中的更多人更像是为上电视作秀而不是寻找恋爱对象的。

面对此类节目,观众褒贬不一,可能导演更关注节目的娱乐性和由此带来的商业价值,而很少考虑到节目对于年轻一代耳濡目染的教化作用。择偶是人生大事,我十分希望相亲类节目能引导人们更真诚地对待爱情。

年终奖年年有,而对我来说,印象最深刻的不是拿得最多的一次,而是有一年失而复得的年终奖,那真是来之不易。

我们单位平时没有什么月度奖、季度奖之类,一年就发两次奖金,名为考核奖,上半年一次,7月份发,年终一次,春节前发。按照一向的惯例,年终奖至少会在半年奖的基础上提高50%,这可是不小的数目,所以大家都特别地看重。

那天财务部的同事告知我奖金已经打入银行卡,下班后我兴冲冲来到附近的银行进行“例行检查”。一看之下,大跌眼镜,在眼前闪现的数字不仅没有想象中的多,甚至还低于半年奖。我生怕自己看错了,再查了一遍,结果还是一样。于是便急忙打电话给财务部的同事,问问是否这回分次发放了,回答是否定的。

晚上回家后,我就一直心神不宁。当年我被评为先进,不要说奖金提高50%,就是翻番也是有可能的,眼下不但没达到上涨幅度,还要下浮,到底是怎么回事?我躺在床上辗转反侧,妻子还以为我哪里不舒服,她哪里知道我已经钻进“钱眼”了。想着想着,脑海中灵光一现:会不会人力资源部搞错了?

失而复得的奖金

花实

越想越觉得有这种可能,当下就决定第二天查证一下。只是这个事情比较敏感,万一这次年终奖真是破了“规矩”,一问之下,既得罪同事,传开了影响也不好。深更半夜,我也没有人商量,就把妻子拉了起来,说了一下前因后果,妻子也赞同我的分析,但如何去求证,却是一桩难事。最后,我们终于想出了一个不着痕迹

的判断得到了印证,估计确实是人力资源部弄错人了。看看阅览室还有其他同事,为免难堪,我就不当面说了,反正是有“奔头”,也就不急在一时。下午看只有同事一人在办事的时候,我就走进直接“摊牌”了,还出示了“证据”:印有奖金数的银行存折。同事拿出底稿一对,大吃一惊,果然是弄错了。原来是给电脑“玩了一把”,奖金是按档分的,一不留神,粘错了位置。同事连声道歉,接着便“拨乱反正”,而我就只等着“数米”了。这么一折腾下来,我倒也百感交集:如果不说,这一年也就白白辛苦了,先进得了也是白搭;但是万一说错了,不免让人觉得自己太小心眼,真是左右为难。还好,夫妻同心,其利断金。借鉴“明修栈道、暗度陈仓”的理念,我公开试探、私下查证,应得的年终奖终于失而复得,实在是幸运至极。那一年春节我特别开心,年终奖明明是应得的,却好像多拿了一份似的,你说奇怪不奇怪?将年终奖统统用于还人情债,换来一身轻松。

我与朱雯、罗洪夫妇,相识于上世纪70年代末。他俩一位是作家、文学家、翻译家,一位是30年代有过较大影响的女作家。他们是文学的知音、生活的伴侣,相濡以沫地共同走过了六十多个春秋。1994年10月7日,朱雯先生因突发脑溢血,不幸逝世。这给罗洪先生一个沉重的打击。她曾对我说:“病魔夺去了朱雯的生命,像断了线的风筝,他飘然而去了。但是几十年的共同生活,甘苦与共,那是不能从我记忆里消失的。”我见书房中朱雯与罗洪拍的照片,相片中朱雯先生神态依然,他是永远活在罗洪心中的。

罗洪从30年代至新中国成立前,出版了十多部长篇、中篇和短篇小说集,是很有成就的女作家,曾受到文坛的瞩目和读者的喜爱,既被誉为“真正的小说家”,又被推崇至“十大女作家”之列。我还听说她1953年9月,作为上海“文协”(上海作家协会)的正式代表出席了第二次全国文代会。近年仍笔耕不辍,长篇小说《孤岛岁月》就是她毫鬓之年的呕心沥血之作,是关于上海“孤岛”时期题材的小说,她迫切希望把一个真实的上海告诉读者。

她开始写作是1930年,不过二十岁左右,从一本期上看到消息,苏州东吴大学学生朱雯等创办一种文学期刊《白华》,即写信去询问刊物情况,开始与朱雯通信。第一篇散文《在无聊的时候》署名罗洪,由朱雯介绍在上海的《真善美》月刊第6卷第1号发表。她原名姚时珍,取罗洪笔名纯属偶然,当时她很喜欢看法国作家罗曼·罗兰的小说,就取了一个罗字,正好书桌上放着本画家洪荒的画册,就欣然取了一个洪字。由此,她和朱雯通信不断,并相约在家乡松江有名的醉白池见面。之后信就写得更多了。两年后,他俩在上海举行婚礼。巴金、施蛰存、赵景深都前来祝贺。这些通信就是1931年由上海乐华图书出版社结集出版的《恋人书简》,署名王坟、罗洪著。这本“情书”大都是谈文学,在当时很新派,也就是说很开放的。王坟是朱雯的笔名,朱雯母亲姓王,他就取了王姓,并用上了“坟”字,大概他认为奇异的名字更引人注目吧,不过以后再也没用过这一笔名了。

如今,在华商出版社总编辑许顺利先生的热情支持下,这本曾经被岁月湮没了八十年之久的年轻恋人的书信集的重新出版,不仅有文化价值,更有历史意义。在出版前,百岁老人罗洪用毛笔写下“青春留痕”四个大字,并亲自校对了书稿。香港作家曾敏之先生为之题词“百岁生命中的爱情之虹”。她的儿子朱行健教授也为这本书出力不少,寻找出父母年轻时代的照片,他们与友人如松江同乡施蛰存、赵家璧,还有巴金萧珊夫妇、赵景深、钱锺书杨绛夫妇、王辛笛等交往的照片等,相信这本图文并茂的书会比初版本更加吸引读者;其中还收入友人们评价罗洪小说的文章,也使这本书的内涵更为丰富。

更令人高兴的是,当杨绛先生得知她的百岁老友还笔健出书时,欣然为《恋人书简》题签书名。2011年正月逢杨先生百岁生日华诞,她比罗洪小一岁。两位百岁老人,一个在上海,一个在北京,虽远隔两地,但她们心心相通,都在为中国文化事业默默地奉献。我们衷心地感谢并祝福两位百岁老人健康长寿! (本文为《恋人书简》再版前言)



十日谈

我的年终奖